

□ 专题文论

文明相遇与跨文化空间的形成：俄国侨民与中国侨民的视角

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俄国侨民及其社会生活

张建华

【内容提要】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北京不仅持续扮演着文化古都和政治中心的角色，并且也发挥近代外交和国际交往的重要作用。自19世纪中期以来，在北京形成的特殊的“外国人世界”中，俄罗斯（苏联）侨民社会是一个颇具特色的案例。20世纪20年代，北京俄侨群体的命运伴随着中国动荡的政治局势而起伏，伴随着中俄与中苏关系的波澜而变化。

【关键词】北京 俄侨 北洋政府 俄侨组织代表大会

【中图分类号】D82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4）02-0007-0008

20世纪初的俄国凝聚着世界风云，这块对东方和西方均为陌生的土地之上爆发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激荡整个世界。伴随着俄国激烈的政治动荡和历经数年的国内战争，数百万俄国人流亡国外，构成了20世纪初国际范围和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波移民浪潮。

在对于俄国人来说同样陌生的东方国度——中国，也出现了大量的背井离乡的俄国侨民。这些俄侨除大量居住于历史上与俄国素有交往的城市哈尔滨、满洲里、大连，以及中国对外交流传统口岸上海、天津、青岛等地外，亦有一部分人来到了中国文化古都和民国政治中心——北京，他们构成了民国时期北京的特殊群体和侨民社会^①。关于中国俄侨问题，中国学界已有相当研究。代表著作：张绥

的《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最先涉及在哈尔滨和上海的俄侨问题。李兴耕等著有《风雨浮萍：俄侨在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石方、刘爽和高凌著有《哈尔滨俄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专门涉及被称为俄侨在中国的“首都”的哈尔滨俄侨历史。汪之成著有《上海俄侨史》（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上海的俄国文化地图》（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俄侨音乐家在上海》

^① 1928年南京民国政府统一全国后，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定北平为首都时又重新改名北京。因此严格讲在1928—1949年期间北京的俄侨应称作北平俄侨，但为叙述统一，本文一律称北京俄侨。

【作者简介】张建华，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7 年版)全面涉及了上海俄侨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张在虎的论文《新中国成立前后青岛苏联侨民的历史考察》(《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二战后中苏青岛俄侨之争——以俄侨恢复苏联国籍为中心》(《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8 年第 6 期)、《二战后初期中苏关于中国俄侨问题的交涉与斗争——以苏联恢复俄国侨民苏联国籍为中心》(《俄罗斯研究》2008 年第 1 期)专门研究了青岛俄侨问题。但涉及北京俄侨的研究并不多见,已有成果集中于 18 世纪和 19 世纪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之上。如:肖玉秋的《试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文化与外交活动》(《世界历史》2005 年第 6 期)、《1715 年至 20 世纪初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研究》(《世界历史》2004 年第 5 期);杨玉林的《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早期历史探微》(《龙江社会科学》1994 年第 6 期);佟洵的《试论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播》(《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9 年第 2 期)等。关于 20 世纪北京地区的俄侨(苏侨)问题未见专题研究。俄罗斯学界关于中国俄侨的研究也基本上集中于哈尔滨和上海等俄侨聚居城市,已有研究涉及北京俄侨亦不多见。谢萨姆季诺夫(А.А.Хисамутдинов)的《北京俄国人社团史》(«К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общины в Пекине»)(《远东问题》2004 年第 2 期)专门研究了民国时期北京俄侨,内容涉及北京俄侨生活、工作、业余文化活动及北京的俄国东方学(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他还著有《下一站——中国:俄侨史》(«Следующая остановка—Китай: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符拉迪沃斯托克 2003 年版)、《中国俄侨:百科全书》(«Россий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в Китае:Опыт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符拉迪沃斯托克 2002 年版)等,也论及了北京俄侨。列维亚金娜(Т.В.Ревакина)的《俄国侨民在中国:适应的问题(20 世纪 20—40 年代)》[«Россий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в Китае:проблемы адаптации (20-40годыXXв.)»](莫斯科 2002 年版)对北京俄侨也有所涉及。已故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别什涅夫教授(中文名:司格林),出版了回忆录《北京——我童年的故乡》(东方出版社 2003 年版)。曾在 1946—1949 年任苏联驻北平领事馆领事的现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外交官和汉学家齐赫文斯基院士的回忆

录《回到天安门》(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版)对于研究北京俄侨有极高参考价值。

一、作为一种文化和历史现象的“俄侨”

侨民是主权国家常见的一种现象,特别是在地域相对狭小、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相对接近的欧洲就更为常见。但是它对于同样是欧洲国家、以俄罗斯族为主、以东正教信仰为主的俄国^①来说,却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

由苏联著名语言学家乌沙科夫(Д.Н.Ушаков)主编、苏联最权威的《俄语详解大辞典》在解释“侨民”(эмиграция)一词时,认为它来自于拉丁语 emigro,将其界定为:“1. 由于经济的、政治的等原因被迫或自愿移居其他国家的人。2. 长时间或经常性地在其祖国以外居住的人。”^②

由于地域相连、文化相通、宗教信仰接近,在俄国历史上,无论是俄国人移居欧洲其他国家,还是其他国家的人移居俄国都是很普遍的事情,甚至连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都是通过联姻入主俄国的,俄国历代沙皇也大都有长期侨居或游历欧洲的经历。

对于普通俄国居民来说,他们移居国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原因:俄国是一个将野蛮落后的农奴制保存到 19 世纪中期的国家,一些农民不堪忍受而逃亡国外。另外,1861 年废除农奴制后直至 20 世纪初,出现了一个一些获得人身自由但失去土地的农民、手工业者和领地工人移居北美和南美国家的高潮。文化原因:俄国文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相对西欧是落后的,因此从 18 世纪起有许多贵族子弟和平民子弟赴欧洲国家学习。战争原

^① 在俄语中,指代“俄国的”经常使用 российский(泛指在俄国居住的所有民族的居民)和 русский(仅指“俄罗斯族的”)两个单词。在涉及“俄国侨民”名词时,也是有所区别的。1993 年 4 月 13 日至 15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由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俄国文化研究中心和俄国现代文化学院主办的“俄国侨民在保存和发展祖国文化方面的作用”的国际会议,会议交流时使用了“россий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рус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российское зарубежье”、“русское зарубежье”、“зарубежная Россия”等不同的名称(См.:«Роль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в сохранении и развит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М., 1993)。本文采用“俄国的”(российский)而非“俄罗斯族的”(русский)的名称来界定这场运动,因为 20 世纪 20—30 年代俄国的侨民运动是以俄罗斯族侨民为主,也包括了其他民族的侨民。

^② Ушаков Д.Н. Толковый 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40.Т.9. С.1420-1421.

因：自彼得一世时代始，俄国一直在为“出海口”、“天然疆界”与西欧列强争霸，许多俄国人为躲避战乱或因边界的变动而移居国外。政治原因：历朝历代均有持不同政见者因专制制度的统治和沙皇政权的迫害，或因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或政见分歧而移居国外。另外，在“混乱时期”（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暂居国外也是俄国贵族阶层和平民的一个历史传统。此外，还包括自然灾害、宗教分歧、文化冲突等原因。

俄罗斯学者认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的人是伊凡四世的近臣库尔勃斯基，他因反对伊凡四世的特辖制改革而被迫于1564年12月逃亡立陶宛^①，并且在海外与伊凡四世通过信函进行政治论战近20年之久。但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前的俄国侨民中，政治原因并不是他们移居国外的最主要因素，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具有批判主义精神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还没有形成，专制制度的国家机器相当强大，专制主义的文化根基相当深厚，沙皇政府的政治反对派相对弱小。而且，从18世纪开始，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完全人身自由的贵族到欧洲旅行和移居都受政府的限制，贵族自由出入国境只是从19世纪50年代下半期才成为可能。20世纪前移居国外的俄国人大部分来自俄国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人数最多的是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此外包括波兰人、芬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但是他们到了别的国家后，就常常被当地人当作俄罗斯人（族），原因是他们中讲俄语和信仰东正教的人较多。

整个20世纪，俄国（苏联）发生了4次较大的移民浪潮：第一次浪潮或称“第一波”（первая волна）发生于两次世界大战间。因1900年以来数次政治风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特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出现的严重的政治对立，陆续有200多万俄国居民移居国外。第二次浪潮或称“第二波”（вторая волна）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主要原因在于苏联强迫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后，当地的居民大量移居国外。爱沙尼亚有总人口6%（约16万人）的爱沙尼亚族人移居海外；拉脱维亚从40年代开始强制集体化运动，有近20万人移居瑞典、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立陶宛居民也大量移居美国，苏联的人口统计数字表明，1959年立陶宛的居民总数低于

1939年的居民总数。其他非俄罗斯民族也有较大的移居规模。据西方学者统计：到70年代初，大约有200万立陶宛人居住在境外，有170万亚美尼亚人生活在境外（其中美国40万人，伊朗20万人，法国17万人，黎巴嫩18万人，叙利亚12万人），有20余万白俄罗斯人生活在波兰，约有220万乌克兰人生活在境外（其中美国100余万人，加拿大70余万人，波兰30万人，捷克7万人，罗马尼亚6万余人，南斯拉夫4万人）^②。在此时期，也有一些苏联军人在战争中被德国或协约国俘虏而留在其他国家不归。第三次浪潮或称“第三波”（третья волна）发生于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其中的苏联犹太人移民现象是由于苏联政府放松对其移居以色列的控制后而引发的，到1982年，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总数达25万人之多^③。另一个现象是80年代中期后，因权利、土地、工作、水源、信仰和文化习俗等发生的不同规模的民族冲突加剧，加之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恶化，大量苏联公民移居国外。据统计，1986年有8000人移居国外，1987年有4万人移居国外，1988年有10万人移居国外，1990年有45.2万人移居国外^④。第四次浪潮或称“第四波”（четвертая волна）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兴起的新移民浪潮，主要是在原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流动，即独立后国家中的非主体民族大量返回以自己民族命名的国家，在这个阶段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又出现了一个新高潮^⑤。

二、北京俄侨的缘起

北京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俄侨的城市。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西征时曾俘获大批俄国人，其中一些

① Чельшев Е.П. 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1917-1940. М., 1994. Т.1. С.16-24.

② [美]卡茨：《苏联主要民族手册》，费孝通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202、77、45页。

③ [美]阿尔蒙德：《当代比较政治学》，朱曾汶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77页。

④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1989г.,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М., 1990. С.44., Неделя. М., 1989. № 22,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19 декабря. 1990., Гласность. М., 1991. № 4.

⑤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契雷舍夫（Е.П.Чельшев）认为：“在十月革命后存在的俄罗斯移民潮一般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或者可以说是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两次世界大战间，第二次浪潮，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第三次浪潮，1970年后，如果有人说还有第四次浪潮的话，那是指苏联解体后兴起的新的移民浪潮。” См.: Чельшев Е.П. 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1917-1940. Т.1. С.2.

人被带回为元朝戍边、屯田^①，《元史》中将其称为“斡罗思人”。元朝在北京设有“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授正三品，负责管理斡罗思军人。《元史》中还有献俘斡罗思人的记录：1332年（元至顺三年），诸王章吉献斡罗思百七十人，筹以银七十二铤，钞五千锭。己亥，给斡罗思千人衣粮^②。

1567年和1619年，俄国使臣两次出使中国，来到当时明王朝首都——北京。其中1619年的俄国使节还带回了明神宗给俄国沙皇的“敕书”。从17世纪下半叶起，随着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俄国与中国的冲突日渐频繁。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中俄爆发了雅克萨之战，中国军队俘虏了许多俄罗斯士兵，其中的一部分被遣送到北京，因他们主要从西伯利亚的阿尔巴津城堡（中文名：雅克萨）来，因此也被称作阿尔巴津人。据《清实录》载：罗刹（俄罗斯人）归顺颇多，应令编为一左领，令彼此相依，庶有资级。他们被编为满洲镶黄旗第四参领第十七左领，驻在当时北京城东北角胡家圈胡同。清朝政府给这些归顺的俄罗斯人相当优厚的待遇。到1693年（清康熙三十二年），中俄签订了通商条约，准许俄罗斯人来华贸易，规定俄国商队每三年至北京贸易一次，一次人数不超过200人；俄商来华期间在北馆（阿尔巴津人驻地）驻留，以80天为限，商队和货物免税。从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起，经清政府同意，俄国派遣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来京念佛传教。到1727年（清雍正五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其中第五款正式将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变为常设机构。此后，俄国东正教会定期派神职人员来北京。这些传教士不仅为俄国政府传送大量有关中国的情报，而且对中国语言、文化、边疆民族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奠定了俄国中国学和东方学的基础^③。

到近代，随着中国不断开放，俄国对华活动、贸易的重点也转到了东北、新疆、蒙古等地，北京不再有先前垄断性的地位，这里所居留的俄侨也很少。不过，作为清王朝及随后北洋政府的首都，北京仍保留了许多俄国在华官方机构。到1917年，北京留有俄罗斯帝国驻华公使馆、中东铁路办事处、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及俄罗斯在华开办的俄语学校^④。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及随后大规模内战，一批新的俄国难民流亡到北京。

三、北京俄侨及俄侨社会

十月革命后及内战时期，大批俄国难民出逃。其中远东的白军裹挟着难民，分别从东北、新疆和蒙古三个方向进入中国，他们大部分都留在了东北、新疆。北京因有帝俄驻华公使馆、北京东正教会等机构，一些俄侨也将此作为登陆中国的第一站。据原北京东正教会司祭赵德本回忆：白军被逐步打垮后，远东地区的许多白军军官和官吏陆续逃到北京，原帝俄驻华公使将他们安置在奥匈帝国使馆内，后又有一部分人安置在北京东正教会闲置房中暂住^⑤。原天津东正教会教职人员杜立昆也在《白俄在天津》一文中记载：白俄主要取道中亚细亚，经由新疆，或取道西伯利亚，经由东北，先到北京，再分赴全国各地。1920年，大批俄国流亡者到达北京，他们派代表向当时北洋政府申请予以安置，结果获准在天坛搭建帐篷暂住^⑥。为了救济这些衣食无着的难民，俄国公使馆与东交民巷外国商团一起联合组成救济机构，筹款供他们伙食并进行安置工作。这些俄侨中的大部分后经东交民巷外国商团介绍前往上海、汉口、大连、青岛等地方工作^⑦。这也是后来最终留在北京的俄侨较少的主要原因。在此期间，北京的东正教会也对流亡来北京的俄侨进行了积极的救助，除积极安置侨民外，东正教会还将大量地产租予俄侨，供他们办企业谋生。

北京的俄侨，绝大部分属于一战后陆续从原俄国本土出逃的难民。虽然一战后出逃到北京的俄侨不完全符合上述条件，但他们不愿或无法获得新成立的苏俄政府保护，也没有加入苏俄或苏联国籍，更没有返回俄国，因此他们是俄国难民。还有一部

① 宋濂、王濂主编：《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册，第770—771页。

② 同上，第800页。

③ 具体了解这一时期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及早期俄国侨民历史，请参阅张绥所著《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中第三编第一章；蔡鸿生的《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有关早期俄国汉学研究情况，参见肖玉秋的《试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文化与外交活动》和《1715年至20世纪初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研究》。

④ Хисамутдинов А.А. Следующая остановка-Китай: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 эмиграци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03. С. 17.

⑤ 赵德本：《俄罗斯帝国驻华宗教代表团在华史迹》，载《文史资料选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编委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79年版，第32册，第147—148页。

⑥ 杜立昆：《白俄在天津》，载《天津文史资料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册，第156页。

⑦ 赵德本：《俄罗斯帝国驻华宗教代表团在华史迹》，载《文史资料选集》，第32册，第148页。

分原先在帝俄时代就已侨居北京的俄国人，许多在十月革命后也没有归附苏维埃俄国及后来的苏联，他们同样没有获得苏维埃俄国的保护，其中大部分也没有再回国，因此，他们也成为北京的俄国难民。逃到北京及一直居留在北京的俄国难民，构成本文论述的俄侨主体。

侨民(emigrants)一般泛指居留在一个国家领域内而其国籍不属于该国的外国人，他们一般有其所属国籍。而这些仓促出逃或居留北京的俄国难民，因国内政权变更实际已丧失原有国籍，苏联政府又曾于1921年12月15日、1924年10月29日和1925年11月13日，三次下达法令剥夺了这些不肯归附苏联政府的俄侨国籍，而这些俄国人大部分又没有加入中国国籍，因此，他们大多就成了“无国籍俄侨”。本文研究的俄侨，主体为无国籍侨民^①。

与这些无国籍俄侨相对，还有一些从苏俄(1917年11月至1922年12月)及苏联(1922年12月之后)陆续来到北京、拥有苏联国籍并受苏联政府保护的苏联侨民，他们包括在北京的苏联使领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在京苏联公民。苏联侨民还包括原先为无国籍侨民、后加入苏联国籍的俄侨。苏侨也算作北京俄侨整体的一部分。本文所论述的北京俄侨由民国时期在北京的无国籍侨民及苏联侨民共同构成。此外，北京俄侨也不仅指居留北京的俄罗斯族人，而是既包括那些认为俄语是自己母语即过去来到中国的俄罗斯人及他们的子女，也有其他民族代表，如鞑靼人、乌克兰人、犹太人^②。同样，苏侨也应包括持有苏联护照的苏联各族人民，而不单指持苏联护照的俄罗斯人。

1920年10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俄侨组织代表大会(Собран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всех русских эмигрант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Китая)。从哈尔滨来的俄侨代表团主席是季申科(П.С.Тишеко)，随团的有卡祖波夫斯基博士(М.Ю.Козубовский)；俄国商界代表为瓦京斯基(Н.В.Водянский)及随行奥巴林(А.П.Опарин)；房地产业代表为库斯科夫(Д.В.Кусков)；法律界的有律师亚历山大罗夫(В.И.Александров)、原边境巡回法院检察长伊扎托夫(Л.И.Изогов)、法律活动家尼鲁斯(Г.Х.Нилус)；从天津来了瓦洛科德斯基(П.В.Вологодский)。大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作为协调所有中国俄侨团体的统一组织^③。

北京政府对大量俄侨入境极为重视。北京警察局在1923年2月呈请的两份报告中均透露出对大批在京白俄的担忧。其中一份称：“访闻辖境内羊管胡同(即胡家圈胡同)俄国东正教会总会主教因诺肯季于本月12日传令教会执役人等修缮房间，据云于日内将有由新疆来京已解武装之俄国白党军人三十余名在该教会内居住……兹据该巡交所探情形，设使该教会内突增多数军人，而品类必不一致，非但该主教有无能力管辖，即地方警察也难以驾驭。此项俄人概失败白党，其赤党方面，难保暗中无人窥探。京师，首善之区，将来有无交涉，熟难预料……”^④大批俄侨到达后，北京警察局的担心更加强烈，并试图与东正教会交涉，寻找管理俄侨、解决治安问题的办法。报告中说道：“现在该教堂(北馆)内居住俄侨三百余名，贫苦就食约二百余人。该堂主教因诺肯季因无力管辖，委托副主教锡孟专职此项贫苦俄人，而该锡孟复委俄人三名、中人一名管理该俄人等一切事物。俄人三名，一名管理卫生，一人管杂务，还有一人专管稽查俄人在外有无滋生事端情事。详查该俄人等确与人力车夫有因车价发生冲突情事。余复往辖境住铺户加以调查，尚无俄人偷窃案件。贫苦俄人既聚该堂，仅就堂内委有人员管理，一经外出，往来既无定所，难免不生别情。查近年来，该堂迭住俄国战败军人，查其护照前往地点率皆上海天津，乃道经北京，必在该堂教会逗留，不去或改道哈埠则又另起护照。现在该教会存住贫苦俄人人数已逾二百，将来人数逾众多，该教堂主教本无管理军人能力，而该处军人又非安分分子，一经外出，难免不滋事端，应否根据其护照游历地点取缔其在京逗留，俾均治安前途有益。匪鲜在京现有之贫苦俄人，职为预防计，已向该教堂交涉，嗣后此项贫苦俄人外出，右肩加以白布一周，上书中文或加以俄、英等文以便铺商注意，而免惹事生端。惟该主教借口与代理公使及侨居北京之多数俄人商妥后，再行妥办。窥其用意，无非

^① 还有部分俄侨加入中国国籍，成为华籍俄人。这些加入中国国籍俄人严格讲已不属于俄侨，但由于其身份及生活的特殊性，本文仍将北京入籍的俄侨与其他没有入籍的俄侨放在一起考察。

^② [俄]斯别什涅夫(司格林)：《北京——我童年的故乡》，于培才、刘薇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③ Хисамутдинов А.А. К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общины в Пекине//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2.2004.

^④ 北京市档案馆：全宗J183，目录002，案卷号00510。

借以延宕时日……”^①

至于北京警察局具体采取的措施,因材料有限,现不得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俄侨给北京的治安带来严重隐患,并且极有可能引起外交上的纠纷。好在不久后大批俄侨就离开北京,分赴中国其他城市。他们离京的主要原因是到其他地方找工作。北京只是许多俄侨的中转站,许多人的目的地是上海、天津等有外国租界、俄国人相对集中的城市。还有些俄侨离京是受到其他地区的俄侨或其亲戚朋友召唤而走。总之,大批白俄在北京聚集了很短时间后就纷纷离去,北京仅保留形式上中国俄侨中心地位^②。

四、中国对北京俄侨的管理

十月革命后,原旧俄领事实际已不能行使职权。北洋政府曾试图撤销沙俄在华领事,收回沙俄在华租界及其他特权,但由于沙俄公使库达舍夫抗议和外国领事团集体威胁不得不作罢。经过两年多交涉,到1920年9月,鉴于苏维埃俄国已牢固确立,北洋政府终于发布废除旧俄公使领事待遇命令,全文如下:

大总统令,据外交部呈称:比年以来,俄国战团林立,党派纷争,统一民意政府迄未组成,中俄两国正式邦交,暂难恢复。该国原有驻华使领等官,久已失去代表国家之资格,实无由继续履行其负责之任务。曾将此意面告驻京俄使。应请即日宣布命令,将现在驻华之俄公使领事等停止待遇等语。查原呈所称各节,自属实在情形。惟念中俄两国壤地密迩,睦谊素敦,现虽将该使领等停止待遇,而我国对俄国人民,固友好如初,凡侨居我国安分俄侨及生命财产,自应照切实保护。对于该国内部政争,仍守中立,并视协商国之趋向为准。至关于俄国租借暨中东铁路用地,以及各地方侨居之俄国人民一切事实,应由主管各部暨各省区长官妥筹办理。此令。(中华民国九年九月二十三日)^③

该文令中除废除旧俄领事待遇外,也承诺对在中国俄侨的生命财产进行切实保护。此后,各地开始接收旧俄领事馆和俄租借地。同时随着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中苏建交提上日程。经过数年的磋商,到1924年中苏双方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中苏正式建交。

在此期间,北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管理俄侨办法。1920年9月21日,北洋政府内务部拟定《管理俄侨办法》7条^④:

(一)在中国境内之俄侨,得于商埠或向准该国人民居住地方继续居留,并得从事与平和适当之职业、及受身体财产之保护,但须服从中国现在及将来随时颁布之法令章程。

在前项地方,如需租赁房屋,应遵守该地方租赁房屋章程,呈请地方官署许可。

但俄侨传教或办理慈善事业,得在内地租赁房屋,并仍遵章呈请。

(二)在中国境内之俄侨,自本办法公布后七日内将住所、职业报明于所居住地之地方官厅,请其登录。俄侨有新入国境者,并应呈请登录。

(三)俄侨如有携带违禁物品之嫌疑者,应受地方官厅之检查。

(四)俄侨如有干犯法纪,扰乱秩序之行为或嫌疑者,及认为有必要情形时,除依法律办理外,得随时令期初出国境,或加相当之监视及制裁。

(五)俄侨赴内地游历,应向地方官厅请领护照,在游历地方,不得有所勘测。

(六)本法令所称之地方官厅,在已设警察地方为警察局。在未设警察地方为县公署。

(七)本办法自公布日施行。

几天之后出台的《待遇俄侨办法》^⑤中,北洋政府明令对俄侨按无约国人办法办理:

(一)各省俄侨由该省交涉人员详细调查,妥为保护;

(二)凡俄侨在华财产,由省长官调查,呈报中央备案;

(三)关于俄侨一切事务,照无约国人之待遇条例办理。

通过上述法令,北洋政府将俄侨管理工作纳入正轨。鉴于各地俄侨注册混乱,政府又于1921年

① 北京市档案馆:全宗J183,目录002,案卷号00514。

② 参见杜立昆:《白俄在天津》,第156页;Хисамутдинов А.А. К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общины в Пекине。

③ 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135页。

④ 同上,第152—153页。

⑤ 载《晨报》1920年10月6日、10月13日。

颁布《俄侨注册办法》5条^①，规范了俄侨注册程序。但是，北洋政府一些管理俄侨的法令及撤销旧俄领事、与苏联展开建交谈判却遭到在华俄侨的反对。1920年10月《晨报》中，有多篇文章刊登了俄人结社请愿反对取消俄领事、反对撤销领事裁判权的消息^②。显然，许多俄侨在逃难中仍念念不忘过去所享有的特权。

随着中苏交往的开始，在华俄侨国籍问题也变得复杂起来。外逃的俄国难民中部分原先持有帝俄护照，而另外许多人则没有任何证件。苏维埃俄国建立和北洋政府停止旧俄领事待遇后，这些俄侨就成了“无约国人”（此时北洋政府和苏俄还没有建交）。随着中苏建交谈判的开始，苏联政府也试图招揽这些“无约国”俄国人入籍。苏维埃政府曾为吸纳流亡在外的俄侨回国，于1921年3月11日颁布大赦令，并在那些承认苏联政府、并与之恢复邦交的国家，由苏联使馆号召在该国的俄侨进行登记，领取苏联护照^③。1924年中苏建交后，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也曾试图招揽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地方俄侨入籍^④。不过，各地俄侨对此均无动于衷。苏联政府见复籍没有效果，于1924年10月29日和1925年11月13日颁布法令，剥夺那些处在外国又不向苏联使领馆归化的俄侨国籍。由此，北京及中国其他地方大部分俄侨就成了无国籍侨民。恐怕北洋政府停止旧俄使待遇及中苏建交对这些俄侨的影响最大。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苏建交，从苏联来了一批使馆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家属，他们成为民国时期北京苏侨的起源。

1927年3月，北京张作霖政府大肆抓捕进步学生及共产党，一些学生和共产党领袖迁入苏联大使馆内暂避。张作霖为抓到李大钊等人，在与英、法、荷等国公使磋商后，于1927年4月6日突袭北京苏联大使馆，抓捕了李大钊等人。与李大钊同时被捕的还有苏联使馆一些工作人员和俄侨。据当时报纸报道，共有三十一名俄人在这次事件中被捕，其中十二人为使馆工作人员，还有教授一名、学生两人，其余身份无法确定。大部分被捕俄人在是年十二月被释放^⑤。随着北京反共气氛的紧张，北京俄侨处境也变得艰难。报纸上报了许多有关俄侨，特别是苏侨的负面内容，如苏联在北京设立密探总部机关，统辖中国、朝鲜各地情报机关；驻华军事密探冒充使领馆人员探查

各地情况及军政要情等^⑥。同时，警察对俄侨的巡查也格外严密。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1927年6月至7月间一系列连续编号档案，都与查验俄人护照、拘留身份可疑俄国人有关^⑦。虽然警察查证护照或身份证明属正常行为，且对无护照侨民也理应带回询问，但如此严密并集中针对俄侨的查证，并在如此短时间内拘留如此多人，从现存档案来看仅这一时期有过，这恐怕与之前的反共高潮和李大钊等人被捕有很大关系。对俄侨的严密防范监视也体现在警察对可疑俄侨的抓捕上。当时的报纸就记载了前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Д.Л.Хорват）将军之子因疑似宣传赤化在西山被捕，后经其父声明为贩售货物后才被释放的消息^⑧。在这一年的反共高潮中，中国俄侨特别是北京俄侨，经历了动荡而又艰难的一年。

1928年10月，从1924年起侨居北京的前中东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将军向外国驻北京使团宣布其为“俄侨社团自治联合会”（Единой эмигрантской общины）首脑，成为中国俄侨的领袖，并派自己的代表到中国其他城市的俄侨团体中。1930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远东俄侨团结大会”（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会后成立了“俄侨组织代表大会”（Съезд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организаций），并签署了各地俄侨反共团体的共同协定^⑨。档案中对此事也有提及。1928年一份档案记载：……据报告散居在中国各地之白俄人总数

① 载《申报》1921年3月14日。

② 载《晨报》1920年10月1日、10月10日。

③ 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第106页。

④ Поздняев Д.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 Китае(1900-1997гг.)，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вято-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 Братского，1998. С.49.

⑤ 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3册，第324—325、361等页。注：《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原名为《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日军侵华期间，曾在中国大陆设立不少情报机构，末次研究所便是其中之一，其总部设在北平，负责人为末次政太郎，专门负责搜集中国情报。该所对1912—1940年7月中国国内发行的50余种中文、日文、英文报刊进行剪辑整理，并按专题汇编成集，以备日军侵华参考使用。其所剪辑的都是当时中国报纸的一手报道，反映了我国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外交等许多方面重要情况，因此具有很强史料价值。《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收藏于厦门大学，1997年整理出版为《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共100册。

⑥ 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83册，第181、199页。

⑦ 北京市档案馆这批档案大致为：全宗J181，目录019，档案号54770至54790。

⑧ 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84册，第24页。

⑨ Хисамутдинов А.А.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в Китае: Опыт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02. С.182.

六十万余，以前中东铁路局长霍尔瓦特将军为中心作大团结，不远将在北京举行关于白俄建设之重要会议……^①俄侨团结大会在北京的召开说明，尽管北京俄侨人数不多，但因有霍尔瓦特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存在，北京在中国俄侨心中还具有很重要地位。

1928年，南京民国政府北伐成功接管北京市，北京俄侨换了新主人。不过，国民党统治下的俄侨处境与北洋政府时期相比并无大变化。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中苏断交，国内一片反苏讨共之声。国民党当局对各地俄侨的监视也愈加严密，唯恐俄侨中有人宣传鼓动赤化，并积极查捕俄侨中宣传赤化嫌疑人。据1929年11月7日一份档案显示，当时北平党务指导委员会民众训练委员会曾接到密报，称在市一区内洋溢胡同十二号有俄人勾结华人聚赌，号召工人秘密会议宣传共产等情……后经查证，此房内并无俄侨，也没有宣传共产的证据^②。民国政府还在入境上采取措施，严格限制俄国人入境。1930年12月，民国政府下发了《国民党中执

委为禁阻白俄工人入境按外人入境护照规则办理》公函，其中规定：遇有苏联人或白俄请求签订入境护照者，倘在华并无固定职业，则概予拒绝。如在华有固定职业并确实保证而查无政治关系者，应详询其职业及入境事由等，逐案报部核准后，方予签证^③。可见这时期，民国政府严格限制俄侨入境。

五、结束语

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俄侨的命运随着中国政治的起伏和中俄、中苏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俄侨经常受到当局的监视和限制。北京俄侨群体在这一时期流动性也很强，许多人仅仅在北京驻留一下，又前往别地。到30年代，北京俄侨群体基本稳定，在各行各业也逐渐活跃，过上了真正异乡侨居生活。

（责任编辑 靳会新）

① 北京市档案馆：全宗J181，目录021，档案号00743。

② 北京市档案馆：全宗J181，目录031，档案号03134。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一），第181—182页。

The Russian Emigrants in Beijing and Their Social Life in 1920s

ZHANG Jianhua

Abstract: In modern time's Chinese history, Beijing not only played the roles like the cultural ancient capital and political center continually, but also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modern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in a special world of "foreigners" in Beijing, Russian (Soviet Union) expatriate society is a characteristic case. In the 1920s, the fate of Russia emigrants community in Beijing up and down with China's turbulent political situation, changed with Sino-Russia relation and Sino-Soviet Union relation.

Keywords: Beijing; Russian expatriate; Beiyang government; Russian expatriate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в Пекине в 20-е годы XX века

Чжан Цзяньхуа

【Аннотац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Пекин продолжает выступать качестве культурной столицы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центра Китая, а также играет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В формирующемся с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в Пекине особом “мире иностранцев” русское (советское) эмигран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занимало особое место. В 20-е годы XX века в жизни рус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в Пекине, вслед за нестабиль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ей в Китае, наступает период взлетов и падений, их жизнь и судьбы менялись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происходящими в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екин; русские эмигранты; Бэйянь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Съезд п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организаций